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

邱继旺, 梁朱贵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通过对外体育援助、支持优秀运动员跨国流动、合理归化外籍运动员等形式, 展现了体育大国的包容性发展风范。我国体育的包容性发展对推动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 快速提升落后国家的体育竞技水平, 补齐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体育在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中始终坚持以推动世界体育均衡发展为目标, 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包容性发展方式,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营造合作多赢局面。当下, 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临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西方国家的话语抹黑以及我国自身体育法规政策建设滞后等诸多挑战。因此, 需要主导构建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 保持大国定力, 不断增强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 同时, 完善自身的政策法规, 合法保障我国体育权益。

关 键 词: 包容性发展; 对外援助; 运动员归化; 体育大国; 大国担当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2)06-0044-06

International practic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sports

QIU Jiwang, LIANG Zhugu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demonstrated its inclusive development as the greater sports country by providing sports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supporting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elite athletes, and reasonably naturalizing foreign athletes.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our coun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he world, to rapidly improve the sports competition level of backward countries, and to make up the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our country. While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China's sport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world sports,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constantly innovated the mod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created a win-win situation for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is facing international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western discourse smear and discredit and China's sports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lags behind, and many other challenges. Therefore, we need to dominate the build sports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and specification system, alleviate sports developmen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and keep the power concentration. Meanwhile, China should improve its own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legally protect China's sport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sports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athletes' naturalization; greater sports country; great country responsibility

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不同国家、民族与公民共同发展、平等参与、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1],

其前身是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初被当作经济术语使用, 随着人们对包

收稿日期: 2022-03-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BA136)。

作者简介: 邱继旺(1977-), 男,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文化、体育管理。E-mail: 1419515245@qq.com 通信作者: 梁朱贵

容性增长深入理解和不断实践,对经济“增长”的这一要求慢慢转向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2],包容性发展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逐渐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其所蕴涵丰富人文关怀和正义秩序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的公平性与共享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世界各国基于发展机会不平等而导致的发展结果不平衡,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3-4]。从国际层面来说,包容性发展突出的是世界“均衡与共同”发展,即大国、强国、发展快、发展条件好的国家应该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帮助小国、弱国、发展慢的、发展条件差的国家,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促进世界一体化和国际分工协作,并使所有国家、人群有机会共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和好处。作为竞技体育强国,我国的很多体育项目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通过多种形式对他国进行体育援助。同时,对于弱势项目,我国也通过归化外籍运动员等手段进行补强,彰显体育大国的包容性发展风范。研究试图对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形式、实践意义、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分析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推进策略。

1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形式

1.1 中国体育援外工作

中国体育援外工作是指中国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民间力量为促进他国体育的发展,动用本国资源对他国体育进行援助的行为,包括硬件援助和软件援助两种形式^[5-6]。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体育援外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展开。1957年越南政府请求我国派遣教练员前往支教,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我国组建了体育援外教练队伍。自此,新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拉开序幕^[7]。1965年原国家体委成立援外办公室,专门负责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极大推动了中国体育援外工作的进展,仅在“九五”期间,中国对外援赠的体育器材就达到500万元^[8]。20世纪70年代,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修建体育场馆等硬件设施,并向叙利亚、塞浦路斯、墨西哥等国家派遣教练员^[9]。2003年1月中国奥委会向蒙古奥委会赠送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体育医疗检测设备^[10]。时至今日,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仍然有条不紊推进,形成政府主导下,企事业单位、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援助的国家包括越南、巴基斯坦、几内亚等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也涉及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援助项目众多,援助形式多样。

1.2 中国运动员的跨国流动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体育援外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一些优势项目的运动员开始跟随体育援外教练员到海外广泛交流。8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初露端倪,一些优秀运动员获得去海外学习或工作的机会。部分运动员甚至申请加入其他国家国籍,出征国际比赛,成为“被归化”运动员。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优秀运动员跨国流动逐渐增多,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1)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多。(2)从流动国度看,发达国家对我国运动员吸引力更大。(3)从项目看,主要集中在传统优势项目,但也有向一些潜优势项目扩散的苗头。(4)从年龄看,我国早期跨国流动的运动员一般是已经在国际大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备一定名气。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跨国流动的运动员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5)优秀运动员在跨国空间转换中难辨身份归属,表现出跨国文化特点和资本主义的商业惯例^[11]。

1.3 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并为此出台一系列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文件,展示大国包容性发展的姿态。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相继颁布《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57号)、《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签证及居留手续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341号)等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中办发[2016]25号),这些顶层设计为我国归化外籍运动员提供法律参考和政策保障。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明确提出中国足球要坚持“包容共享,开放发展”,实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吸引高水平足球人才来华工作,完善出入境、居留、医疗、子女教育等相关政策^[12]。在2018赛季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上,中国足协明确提出,将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外籍优秀球员归化速度。在中国政府、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以及俱乐部自身的精心准备下,2019年1月31日原挪威籍球员侯永永、英国籍球员李可两名华裔球员率先加入中国籍,拉开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序幕。随后几个月,埃尔克森、洛国富、阿兰等无中国血统的球员相继入籍中国,另有几个在中国联赛征战多年的外籍球员正在着手办理入籍手续,一时间,中国足球界掀起了一股归化热潮^[13]。中国足球拉开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序幕后,部分项目也紧随其后,启动了归化外籍

运动员程序,如冰雪运动的谷爱凌等归化运动员在冬奥会上大放异彩,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

2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意义

2.1 通过积极对外援助,推动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

由于环境、人种等自然和生物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各不相同,世界体育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状态,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缪尔达尔^[14]认为,如果长期推行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回波效应”,从而加剧经济社会全面的不平衡。也有学者指出:“非均衡发展只是均衡发展的一个不得已的中介而已。”^[15]世界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体育的均衡发展,使全人类拥有平等参与体育的机会,共享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中国积极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通过对外援助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展现体育大国包容性发展风范。在硬件投入方面,中国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援建大量的体育场馆,援助了众多体育设施器材,改善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运动环境和条件,让广大亚非拉人民拥有较好体育运动基础条件,得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即便是在自身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也未停止对外援助的脚步,如 1967 年 4 月我国无偿援助索马里价值 4 万多元的体育器材;1967 年 12 月我国帮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扩建体育场馆设施,耗资约 12 万英镑^[16]。在软件支持上,中国外派优势体育项目人员把中国先进的体育理念、技术带到世界各地,为被援助国体育事业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极大提升被援助国竞技体育水平,带动被援助国群众体育的普及。在当下奥运会及其他国际体育赛事上,能够站上领奖台的国家和地区在不断增加,这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发展本国体育的努力,也显示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力量。

2.2 中国优秀运动员的跨国流动,迅速提升了归化国的竞技水平

习近平^[17]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是包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迅速,步入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行列,拥有一批优势明显的竞技项目,也涌现出大量优秀运动员。我国的一些优势项目人才储备丰富、后备力量强大,而部分国家却因自身条件所限,导致人才短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跨国流动既使他们有机会代表他国站上世界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有利于运动员自身价值的实现,又能迅速提高归化国的体育竞技水平,推动一些体育项目的全球化发展,让全世界分享我国体育发展成果和经验的同时,更让全世界分享中华民族的和谐与包容^[18]。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优秀运动员开始被他国归化到现在,活跃于国际赛场的原中国籍的优秀运动员越来越多,逐渐形成“海外兵团”。这些被归化运动员往往能够为归化国取得优异成绩,提升归化国的竞技水平,带动归化国某些运动项目的深入发展。如李东华为瑞士体操队获得过世锦赛冠军和奥运会金牌,赵常玲、姚丽为哈萨克斯坦举重队获得奥运金牌,而李佳薇、冯天薇担纲的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则在 2008 年奥运会上帮助新加坡时隔 48 年后再次获得奥运会奖牌,使得新加坡举国沸腾,引发了新加坡的乒乓球热^[19]。

2.3 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逐步补齐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迅猛,成绩卓越,但必须正视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益等依然存在不平衡问题,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优势项目与弱势项目之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我国大赛成绩的取得主要依赖跳水、羽毛球、乒乓球、举重等优势项目。以 2016 年的伦敦奥运会为例,我国在跳水、乒乓球、举重、体操、羽毛球、射击 6 个项目上共获得 26 枚金牌,约占金牌总数的 68%^[21]。而在田径、游泳、“三大球”、水上项目等“重金项目”上,我国与美国、英国等竞技体育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男子三大球项目,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短期内仅靠国内人才储备难以扭转局面。在我国自身后备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要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均衡发展,就需要借助外力,归化外籍运动员成为一条重要途径。“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22]。通过归化外籍优秀运动员,可在一定程度弥补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优化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实现 2019 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到 2035 年,我国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23]的战略目标。

3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经验

3.1 坚持以推动世界体育事业均衡发展为目标,肩负体育大国责任

由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世界体育长期以来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其

体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发展自身体育事业的同时,始终坚持以推动世界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为目标,为世界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此,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便展开了对外体育援助,极大提升了受援国的体育基础设施、人才储备、竞技成绩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以乒乓球项目为例,仅在1966—1978年年间,我国乒乓球教练员援外人数达122人次^[24]。在蔡振华担任乒协主席时,实施“养狼计划”,不仅鼓励优秀教练员和球员“走出去”,到世界各地传经送宝,而且把外国选手“引进来”,让他们与中国国家队、地方队一起训练,参加中国职业比赛,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中国乒协的这一举措正是围绕推动世界体育事业均衡发展这一目标,完全跳出计较一时、一国之得失的小格局,担负起体育大国的责任。正如外国学者评论,中国政府与它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最大不同是“无附加条件”,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附加条件是一种卑劣行径^[25]。

3.2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方式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变换的时代需求,中国体育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包容性发展方式。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中国运动员被他国归化、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是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具体形式,出现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生动反映了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道路上的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广大亚非拉国家落后的体育发展现状及援助请求,积极展开了对外援助,给予广大亚非拉国家体育硬件投入和软件支持,而且几乎是无偿援助。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优秀运动员开始走出国门,有些运动员最终被他国归化,代表他国登上国际竞技舞台,为推动和提升归化国体育发展水平、促进世界体育均衡发展添砖献瓦。2019年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又有新举措,即我国迈出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实质性步伐,侯永永、李可、埃尔克森等一批华裔与非华裔足球运动员加入中国籍,亮相国际赛事。在北京冬奥会上,以谷爱凌为代表的归化运动员大放异彩,彰显中国体育更加开放、包容的一面。

3.3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营造合作双赢局面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与洲际间联系愈发紧密,任何国家与区域都无法脱离国际社会而独自存在。自多边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中国先后宣布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不断与其深化交流合作^[26]。“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过程中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为促进世界体育的均衡与共同发展,长期无私为世界各国提供体育发展

资源,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体育发展的伟大成果,同世界各国共享体育发展机遇、共谋世界体育发展大计,积极推动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变革。当下,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体育发展中的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多并以不同形式呈现在全人类面前,需要世界各国以合作方式共同应对。世界各国只有摒弃因制度、信仰、文化的差异而引发的不信任,甚至敌对状态,在相互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提升体育领域的合作,才能共同建设世界体育发展的新秩序,营造世界体育发展的合作双赢局面。

4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曼瑟尔·奥尔森^[27]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包容性发展是中国体育长期践行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推动世界体育均衡、公平发展的全球体育治理理念。但推行包容性发展理念需要倚仗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和机制进行动员、组织和协调,需要世界各国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共同打造促进世界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的开放、有序、公平的国际体育秩序。在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体育大国、强国、发展快的、发展状况好的国家与体育小国、弱国、发展慢的、发展条件差的国家的体育权利、责任与义务,调动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世界体育事业均衡发展的积极性,解决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是塑造公平有效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关键,也是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4.2 西方国家负面话语的诋毁和抹黑

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引发西方国家的惊恐和担忧。“中国威胁论”“替代论”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伪理论”,他们本能地将中国的发展理念视为试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取代其霸权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加以诋毁。中国体育对国际社会的援助和贡献也成为西方国家极力抹黑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便积极开展对外体育援助并持续至今,特别是对广大亚非拉国家,从人、财、物进行全方位的援助,极大提升受援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促进亚非拉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完全无视中国在促进亚非拉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而是运用“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等话语抹黑、诋毁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体育援助,将中国体育的包容性

发展置于其臆想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实质上,西方国家诋毁、抹黑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背后隐藏着国家利益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和恐慌的反映,也是西方国家试图在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策略的写照。

4.3 我国相关体育法规政策建设的相对滞后

在我国体育长期践行包容性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凡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我国体育法规政策建设的相对滞后,给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损失。以我国运动员黄穗和李明阳被他国归化为例,这种非正常归化造成我国优秀运动员被动流失,破坏国际体育秩序,有违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必须加以防范。同样,我国体育的对外援助也曾走过不少弯路,造成自身利益的损失。当下,我国又拉开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序幕。面对这一新兴事物,我国的相关法规政策并不明朗。如果不及时制定,防患于未然,必将导致归化外籍运动员行为无序,最终损坏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体育形势和国内体育发展需要,未雨绸缪,构建完善的体育法规政策体系,保护我国体育利益是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5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推进策略

5.1 推动国际体育行为规范系统建构,提升世界各国集体行动能力

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推动世界体育事业的公平正义、均衡发展不惜余力,以长期的包容发展姿态彰显体育大国风范,但推动世界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仅靠一国或几国的努力与包容远远不够。人类世界作为一个松散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一套为所有或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这是一个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基本条件^[28]。因此,中国体育走包容性发展道路,推动世界体育公平、均衡发展,首先需要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类体育组织明确包容性发展对世界体育事业的伟大意义,共同建构一套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包容性发展的规范和规则系统。然后充分发挥世界体育包容性发展的规范和规则系统,明确世界各国的体育权利、责任和义务,确立世界各国在体育发展中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方式和程序,缓解体育发展中国家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号召世界各国在全球体育治理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心同向同行,共克艰难困苦,助推全球体育更好造福全人类。

5.2 保持大国定力,不断增强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

西方国家对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抹

黑体现西方国家对我国加速发展的极度恐慌、对自身衰落的过度担忧和对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体育发展道路广泛影响力的深度焦虑。给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胡乱贴上标签、极尽抹黑之能是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我们首先应该保持大国定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包容性发展之路,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建设没有霸权的共商共享共建的崭新世界体育秩序。其次,我们也要主动出击,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体育话语权。当前,西方国家占据国际体育话语体系的主流地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话语霸权”,中国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育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表达自身的体育发展诉求^[29]。因此,我们需要强化体育权利意识,勇于向世界传递中国体育话语,表达中国体育诉求,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肩负体育大国的国际责任,逐步推动公正、合理及多元的国际体育话语体系的构建。此外,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形式加强我国体育外交管理人才的培养,争取在各级各类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逐步改变国际体育话语权“分配”不平衡的状况。

5.3 完善我国体育法规政策,合法保障自身体育权益

体育法规政策是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不管是我国体育对外援助,还是运动员归化,均需要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操作性的法规政策作保障。如为防止我国优秀运动员被非正当归化,我们的体育管理部门应该反思、检查我国体育培养人才程序中的漏洞;加强研究各级各类国际体育组织归化外籍运动员的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根据我国法律及我国体育发展等现实状况,制定出与国际体育组织接轨的中国运动员被归化方面的规定,确保中国运动员被归化有法可依,实现依法归化,这样既能促进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彰显负责任的体育大国风采,又能合理、合法保障自身体育权益。同样,我国在面对归化外籍优秀运动员这一新兴事物时,也应该准确把握不同运动项目国际体育组织各自不同的自治规则,强化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制度构建,实现我国与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与法规的接轨。

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形式多样,手段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部分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维护世界体育事业的公平正义,促进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也对逐步补齐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国际社会并非风平浪静,因此尽管我国体育在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时积累丰富经验,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既要通过继续推进我国体育的包容性发展展现自信、开放、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形象,也要积极应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推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育秩序的建构。

参考文献:

- [1] 张幼文. 包容性发展:世界共享繁荣之道[J]. 求是, 2011(11): 88-94.
- [2] 汤志华, 吕剑枫, 刘晓华. 包容性发展:中国模式的内在价值分析[J]. 党政研究, 2017(2): 46-51.
- [3] 高传胜. 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12-17.
- [4] 卿凯丽. 百年党史发展历程下的体育强国思想特征探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21, 20(6): 40-44.
- [5] 新华网:中国的对外援助[EB/OL]. (2014-07-10)[2022-01-20]. <http://news.xinhuanet.com>
- [6] 俞大伟. 我国体育援外教练工作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2(5): 16-18.
- [7] 俞大伟. 从无偿到合作: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导方式转变探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6, 31(2): 112-118.
- [8] 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培训中心. 新时期体育改革发展之研究[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1: 92.
- [9] 立大国风范 树中华形象[N]. 中国体育报, 2009-08-18(3).
- [10] 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体育年鉴2004[M]. 北京:中国体育年鉴社, 2004: 42.
- [11] LOYD L W, RICARDO T. Global celebrity athletes and nationalism: Fútbol, hocke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J].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6, 2022(2): 18-32.
- [12] 人民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正式印发[EB/OL]. (2016-04-11)[2022-01-20]. <http://sports.people.com.cn/n1/2016/0411/c22134-28265882.html>
- [13] 梁朱贵, 金育强, 何刚. 日本足球发展中的外籍运动员归化及对我国的启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5(4): 386-391.
- [14] MYRDAL G. The theory of monetary equilibrium[M]. London: D.R.Horton Inc, 1939.
- [15] 胡位钧. 均衡发展的政治逻辑[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103.
- [16] 俞大伟.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 33(8): 39-41.
- [17] 习近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4-03-28.
- [18] 俞大伟, 袁雷, 郑元男.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运行体系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7, 40(1): 29-34.
- [19] JASON P. Foreign talent, local glory: Can national excellence be outsourced? [J].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13(2): 186-201.
- [20] 国家体育总局.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23-28.
- [21] 彭国强, 杨国庆. 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特征、问题与路径[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8, 52(10): 5-12.
- [22] 习近平.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14-02-18.
- [2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国办发(2019)40号)[Z]. 2019.
- [24] 韩方廷, 谭明义, 钟颖慧, 等. 乒乓球海外兵团的发展历程与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1): 38-41.
- [25] COPPER J F. China's foreign Aid: An instrument of Peking's foreign policy[M]. Lexington: D.C.Heath and Cpmpany, 1976: 271.
- [26] 刘纯献, 刘盼盼.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价值观研究[J]. 体育学刊, 2021, 28(4): 1-7.
- [27] MANCUR O.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28] 刘盼盼. 新发展理念下体育强国建设方略探讨[J]. 体育学刊, 2019, 26(1): 32-35.
- [29] 曾诚, 邓星华. 体育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J]. 体育学刊, 2016, 23(2): 39-42.